论陪都语境下张恨水的重庆书写

李永东

引 论

地域文化、市民文化、传播接受等角度，是学者们在张恨水研究中常取的路径，亦被认为是贴近对象的有效阐述方式。然而，当我们反复辨析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与北京、上海、安徽的地域文化或市民文化的关系的同时，是否重视过战时重庆文化对张恨水创作的影响？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张恨水对文学接受传播之道的深切洞察，可有兴趣探讨张恨水的创作与战时重庆读者的声气相求？笔者认为，张恨水小说研究的现状，包含了学术界对陪都文学和重庆文化语境的双重轻慢。无论近二十余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是各种“文学史”、“评传”、“回忆”以及多次“研讨会”，都忽略了张恨水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重庆语境，忽略了与战时重庆地域文化的关联，至多提到张恨水小说中的重庆自然环境描写和四川方言运用，再不就是以“反映了陪都的黑暗现实”这样的不具有本质区分意义的“类”分析来立论。浏览几篇相关的研究述评和会议综述（1），同样可以看出，在张恨水的小说研究中，“重庆”基本上处于视域之外。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张恨水在重庆生活了八年，且创作了六部重庆题材的长篇小说。因此，撇开“重庆文化语境”来谈论张恨水的后期创作，难免有缺憾和偏颇。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择从战时重庆（文化）语境的角度，来论述张恨水四十年代的重庆题材小说。

抗战爆发后，张恨水离开南京，溯江而上，于1938年1月10日到达陪都重庆，开始了战时的编辑和写作生涯。1945年12月3日，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发表《告别重庆》一文，于次日乘坐带篷卡车，离开了重庆。张恨水在重庆生活了将近八年。

张恨水在陪都的创作，值得称道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写重庆的，包括《八十一梦》《牛马走》（即《魍魉世界》）（2）、《傲霜花》（即《第二条路》）（3）、《偶像》，这四部长篇小说都连载于重庆的《新民报》。抗战后在北京的两年，张恨水又写了《巴山夜雨》和《纸醉金迷》，继续讲述着战时重庆的故事。“胜利后的两年间，……我只给《新民报》写了个长篇《巴山夜雨》，又给上海《新闻报》写了个长篇《纸醉金迷》，如此而已。这两部书，都是以重庆为背景的，在别人看来，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我自己是作了一个深刻的纪念。”（4）可见，无论战时或战后，重庆都是张恨水小说书写的重心。

作为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有着清醒的读者意识，能够根据各地的文化风气量体裁衣。张恨水在陪都时期的创作，“发表于汉港沪者，其小说题材，多为抵抗横强不甘屈服的人物。发表于渝者，则略转笔锋，思有以排解后方人士之苦闷”（5）。《纸醉金迷》中亦有这样的话：“四奶奶之有今日，是重庆的环境造成的”（6）。由此，就引发我们思考：张恨水的重庆书写与陪都的文化语境有何关系，他的小说在哪些方面切合了陪都的文学需求，与重庆地域文化有何联络？

一、重庆文化语境对叙事风格的制约

张恨水擅长诗文，讲求文字的儒雅，其言情小说不作淫声，其社会小说也绝不走向揭露隐私、谩骂泄愤的邪僻路子。总的来说，张恨水的小说在写景造情、描摹心理、构设对话等方面，都体现出雅致纯净的叙事风格。但是，如果把张恨水二、三十年代的小说与四十年代的重庆书写相比较，就会发现，其叙事风格存在较大差异。张恨水写于三十年代的《啼笑因缘》，最能吊起读者口味的，恐怕要算樊家树与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的三女一男恋爱故事将如何收结。情节当中留下了许多“扣子”，再加上小说有意安排的“误会”，使得婚恋故事变得枝枝蔓蔓、扑朔迷离。《春明外史》以一首九言诗开头，小说中亦穿插诸多诗词，沿袭了传统小说诗词错杂的叙事风格；《落霞孤鹜》《太平花》开头就是一大段景物描写，起始的叙事速度较为缓慢。比较而言，张恨水在重庆的小说创作，诗词的点缀明显减少了，与情节发展不是很密切的情景渲染被压缩，不再有意设置悬念，而是通过宣泄战时流亡者的心理和情绪来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依靠增加事件的密度和快速推进情节发展来维持叙事的张力，《牛马走》《傲霜花》《偶像》《八十一梦》中的各章，都是在首段三言两语就引出主要人物，快节奏启动故事情节。需要说明的是，同样是写战时重庆题材的，战后发表于北平的《巴山夜雨》，从文字到主要人物的性格，文人气要浓厚的多，这应是张恨水出于对首善之区读者品位的考虑。不过，整体来说，张恨水的重庆书写与之前的创作相比，在叙事风格上更平实通俗。

张恨水创作风格的变化，在小说回目的调整上亦可见出。张恨水写重庆的小说，包括抗战时期写于重庆的《牛马走》《傲霜花》、《偶像》《八十一梦》，和战后两年写于北平的《巴山夜雨》《纸醉金迷》，都不用工整的对句回目，用的是单句章节名，少了书卷气文雅气，变得简洁明了。张恨水原本非常讲究小说回目的制作。来重庆之前，他在北京、上海发表出版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等小说，在回目的制作上定了好几个原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高潮。二，尽量的求其词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混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以此，“求得每个回目的写出”，“能博得读者推敲”。如《春明外史》第一回的回目是“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 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啼笑因缘》第一回的回目是“豪雨感风尘倾囊买醉 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落霞孤鹜》第一回的回目是“雪巷遗金解囊感过客 妆台调粉对镜惜华年”。可见，张恨水小说的回目颇为讲究，非常雅致，有宋词的意境，颇合北平文人雅士和江浙老派市民的审美情趣与欣赏习性。在重庆的时候，张恨水发表于上海、香港的小说，如：为上海《新闻报》写的《水浒新传》《夜深沉》《秦淮世家》，同样讲究回目的制作，用的是典雅的九字或八字的对句回目。离开重庆之后发表的非重庆故事的小说，用的也是典丽工整的对句回目。而在战时重庆发表的重庆题材的小说以及在北京写的重庆题材小说，则改回为章，追求明白简单。我们试举张恨水重庆题材小说第一章的标题：“重庆一角大梁子”（《纸醉金迷》）、“心理学博士所不解”（《牛马走》）、“化妆品展览会”（《傲霜花》）、“菜油灯下”（《巴山夜雨》）、“号外号外”（《八十一梦》）、“艺术与战争”（《偶像》）。小说题目也弄成了“牛马走”、“第二条路”、“八十一梦”这样的大白话。

从张恨水小说创作的嬗变，以及重庆书写的叙事风格，可以看出，张恨水对重庆是另眼相看的。这种另眼相看，包含了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对重庆地域文化品位的理解，也包含了他对战时陪都整体审美情趣的体味。

重庆人性格耿直豪爽，交流习惯于快言快语，不讲究文辞的修饰。张恨水曾在散文中对北平、上海、成都与重庆文化进行过比较，认为重庆的城市文化根基浅近，缺少诗意韵味，不含蓄，显得俗气。（7）因此，文绉绉的诗词穿插，静止的景物环境描写，处心积虑的悬念设置或者故事的延宕、情节的松弛，都不合大部分重庆市民的文学胃口，明白如话的章节标题，更适合耿直而少儒雅的重庆本土市民，没必要把回目弄得文气十足，曲里拐弯，亦不必用典故辞章、华丽词藻。

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重庆书写的叙事策略，当然不只是考虑到重庆本土读者和文化传统。作为战时陪都，重庆是个移民城市，移民的人口大大超过战前重庆市的人口。从陪都人口教育程度来看，文盲所占比例不到30﹪，（8）能识文断字的市民占的比例相当高。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受教育的程度和重庆战前教育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推断出，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这些人，大部分是战争移民。那么，张恨水的小说主要应当考虑移民的阅读需要。重庆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市民群体，与北京、南京的市民社会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和南京都曾是几朝古都，文化蕴积深厚，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市民阅读群体，文学审美趣味趋于稳定一致，大致属于儒雅消闲一路，与张恨水三十年代的小说风格相一致。重庆的多数市民群体是因战争而聚集到这个没有多少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张恨水的小说要在混杂的战时重庆移民中获得“多数”，完全照搬北京、南京的套路肯定不能如愿以偿。作为移民城市，重庆与上海似乎可以归为一类，但一个是租界城市，一个是战时陪都，文化语境有差异。战前上海租界语境所欢迎的言情、武侠、侦探小说，并不同样程度地适宜于战时重庆的语境，上海租界的左翼文学思潮和先锋文学实验，同样不适宜在战时重庆发扬光大。陪都重庆移民的广泛，漂泊的心态，战争语境中气氛的压抑，情绪的浮躁，生存问题对知识分子灵性的磨损所导致的诗意缺失，以及大后方贫富的悬殊、生活的腐化所酝酿的畸形世态，等等，决定了张恨水重庆书写在叙事与语言上，采取了平白直捷的风格，俯就芜杂、浮躁的移民读者的阅读心态，以社会小说的形式，以带有趣味性的批判笔墨，来缓解移民群体的愤懑和沮丧。

二、流亡重庆的下江人的战时乡愁

张恨水的重庆题材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下江人”的故事。“下江人”的视点不仅嵌入文本内，也在文本外起着调控作用。连载于重庆《新民报》的《第二条路》（即《傲霜花》），在涉及到四川方言词汇的地方，竟然在括号中加以注明：“最近由印度运到一大批新书，我的眼睛大打其牙祭。（若干天吃一顿肉，川人谓之打牙祭）……再不然，邀着附近的穷教授们在路上散散步，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摆摆龙门阵也就消磨了两三小时（四川谓谈天为摆龙门阵）。”（9）照常理说，小说在重庆创作，在重庆发表，读者限于大后方，使用四川方言词汇而加注释，纯属画蛇添足，但就是这似乎画蛇添足的细节，表明了张恨水预设的主要读者是下江人，表明了张恨水小说创作的下江人意识。

下江人是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每一地区所说的下江人的范围有所不同。在重庆，“所谓‘下江’，泛指三峡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10）“下江人”则是对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各省人的统称。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是一个四川人为主的城市，1937年人口为47万，其中由外省迁入者只占4.8﹪。战后重庆人口突破100万，新增的人员基本上为因战争流亡到重庆的外省人。其中，下江人很多。《回眸下江人》一书的作者“估计是在数百万人”。（11）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其辞之嫌，但从战时重庆移民的来源来看，下江人是占多数的。作家当中属于下江人的有茅盾、林语堂、梁实秋、艾青、田汉、胡风、路翎、冰心、曹禺、吴祖光、叶圣陶、夏衍等。张恨水自然也属于下江人。虽然战时重庆的外省移民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并不限于下江人，但是，张恨水在小说文本内外构设的视点，基本上不是“泛”外省人，而是下江人。因此，本文这一部分在行文中就直接以“下江人”置换“外省人”——尽管表面上看来，某些陈述使用“外省人”更周全。

在张恨水的重庆书写中，下江人意识非常明显。张恨水的小说通过人物形象、地域方言、隐性视点等信息，载负着下江人的战时乡愁。

首先，下江人构成了重庆书写的主要人物谱系。《八十一梦》中的诸多人物，《巴山夜雨》中的李南泉夫妇，《牛马走》中的区庄正一家，《傲霜花》中的华傲霜、苏伴云、王玉莲、唐子安，《纸醉金迷》中的魏端本、田佩芝、范宝华、朱四奶奶，都是下江人。纸上的下江人形象和生活遭遇，为重庆的下江人提供了战时乡愁的精神会餐。

其次，张恨水小说的重庆书写，对于重庆的城市格局、地势气候、建筑特色、服饰饮食、娱乐形式、交通工具、物价涨落等方面的描绘叙述，尽量详尽周全，提供了一种隐性的下江人漫游重庆的视野风格，为下江人阅读重庆故事扫去了地域经验所带来的阻滞感，并且丰富了下江人的“异域”生活经验。循着李南泉“躲警报”的经历，重庆防空洞的结构和躲空袭的情形跃然纸上。（《巴山夜雨》）随着田佩芝沉迷赌博和范宝华购买黄金储蓄券故事的展开，市中心区、歌乐山、南岸的生活空间组合，都得到了条理清晰的呈现。（《纸醉金迷》）《偶像》一开头就说到：“疏建区的房子，是适合时代需要的一种形式。”（12）然后对房子的材料、结构进行了一番明白的解释。《牛马走》开头就是关于重庆雾的描写：“天空集结着第三天的浓雾，兀自未晴，整个山城，罩在漆黑一团的气氛里面。不过是下午三点钟，电灯已经发亮了。老远看着那电柱上的灯泡，作橘红色的光芒，在黑暗里挣扎出来。灯光四周，雾气映成黄色，由那灯光下照见一座半西式的大门里，吐出成群的人。”（13）读了张恨水的这些小说，我们甚至对陪都女人化妆品的种类、男人香烟的牌子和饭店珍稀菜肴的价格，都耳熟能详。可以说，张恨水为下江人提供了一份详尽的陪都生态图景，使流亡的下江人进入重庆提供了便捷。

第三，对于流亡者来说，当地方言的隔膜感和家乡话的贴心感，最易唤起内心深处的乡愁。为了让下江人在小说中找到语言的家园感，张恨水在摹写各地人物语言的时候，把各地方言与标准国语、四川话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以标准国语为主以方言为辅的杂糅性语言风格。为了减少四川方言带给下江人的拒斥感和陌生感，小说在叙事过程中甚至在方言间进行转译。如这一部分开头我们提到的例子。再如《纸醉金迷》中对吴嫂说的一句话的处理：“管她啥子小姐，我不招闲（如沪语阿拉勿关），我过两天就要回去，你格外（另外也）请人吧。”（14）由此可以看出，即使违背叙事原则，张恨水也要以加括号的方式，让下江人拥有语言的家园感。相反，小说偶尔大段使用令一般重庆人不知所云的“上海话”、“宁波话”时，并不加以转译。如《八十一梦》“第五梦 号外号外”中有一个刘老板，满口的宁波腔的上海话，说“耐阿可以打一个电话拨秦科长，格批末事，就算俚公家定来里。公家愿意退脱仔，格笔定洋，算阿拉事先代公家垫出去格，将来公家划上一笔，问题就结末哉。……”（15）刘老板的上海话，肯定让一般重庆本土读者难以消受，但小说并没有因此用四川话或国语来转译。这愈加说明张恨水小说尤其在意为下江人提供语言家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牛马走》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同，小说从叙述语言到人物语言，采用的都是标准国语和四川话，并不去模拟下江人的家乡话。实际上，这部小说是以间接的方式来承担下江人的语言乡愁。小说凡涉及下江人物，就频繁地采用方言类别来透露身份，指明其说的是南京话、上海话或江淮口音、苏州口音等等，以引发下江人想象性的语言认同感。抗战时期张恨水以重庆为题材的小说都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新民报》能够让“四川人和下江人都视为是自己的报纸”，（16）恐怕与战时重庆的下江人和四川人在张恨水小说中都能找到语言的家园感也有关系。战后的两部小说与战前的四部小说相比，方言的种类份量有所区别。战时张恨水的重庆书写使用的外省方言比较多，那是为了抱慰下江人的乡愁。战后张恨水的重庆书写有意增强了四川方言的份量，那是为已归返家园的当年重庆的下江人提供回忆的语言。这种国语与各地方言杂糅的语言风格，切合了陪都移民的构成模式和战后人们回忆陪都生活的情感需要。

第四，作为重庆的“闯入者”，张恨水小说中的下江人在打量这个城市时，习惯于把重庆与故乡的城市进行比较，借助战前的城市经验来理解和评判重庆，同时牵引出记忆中的城市生活。张恨水对北平、上海、南京、重庆等都非常熟知，他在《晚香玉花下》一文中表达了对北平、上海、重庆、成都几个城市文化品位的褒贬。（17）他对这些城市的评判态度，与重庆题材小说中下江人的看法相一致。在下江人的心目中，北京是首善之区，上海是一个繁华梦，南京是民族意识中的首都，重庆则充满拜金主义，颓废堕落，表面的繁华奢靡掩饰不了文化的无根底。重庆生活引发下江人遥忆故园的惬意时光，以此抚慰流亡重庆所经受的窘迫、失意和无奈之感。

最后，张恨水的重庆书写构设了下江人归去的怅惘。张恨水与其他下江人流亡到重庆，怀有“飘零作客”（18）的怆惶感，早日归返故园是绝大部分下江人朝思暮想的心愿。不过，由战时陪都回归故乡的心理路程，并非纯然的“漫卷诗书喜欲狂”，因为陪都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他们的陪都遭遇，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地位，重塑了他们的心理现实，甚至重组了他们的家庭关系。张恨水在《八十一梦》和《纸醉金迷》中，以犀利的笔触进入了下江人归乡的惆怅。《八十一梦》的“第五梦　号外号外”和“第八十梦　回到了南京”预想了南京光复后陪都的下江人和留守南京的下江人的丑态百出。在“第五梦　号外号外”中，陪都的下江人感觉自己与国民政府共磨难共荣辱，于今旧都光复，他们纷纷吹嘘自己是胜利的“功臣”。他们早已在陪都培育出“发国难财”的习性，于今旧都光复，自私势利的他们，自然不会放过“发胜利财”的机会，且大有把在重庆商业投机的做派带往南京的势头。“王老板要抢回南京去开更热闹的大店，沈天虎要回南京区出十本小册子，就是那个算命的山人，也要宣传曾出力抗战，向社会索要代价了。”（19）穷苦的下江人则哀叹没有川资回南京。回到了南京的下江人又如何呢？“第八十梦　回到了南京”设想了由陪都回到南京的张先生的观感和遭遇。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市民对来自重庆的张先生充满敬意，因为他是“抗战入川过的”，同时认为来自陪都的人都腰缠万贯。南京已不是当年有文化品位的南京，而是如重庆一样乌烟瘴气、纸醉金迷，到处都是想倒腾房子发财的人，张先生在这个城市已找不到家园感，亦没有栖身之地。《纸醉金迷》的故事背景是抗战胜利前夕，范宝华等游击商人在胜利消息频频传来时，“反是增加几分不快”，一心只想抓紧时间在黄金投机上大捞一笔，衣锦还乡。对于那些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在重庆又有“抗战夫人”的下江人来说，返乡将面临着棘手的家庭纠纷问题。而对于四奶奶这类人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不是感到欣喜，而是感到末日来临的恐慌。四奶奶对曼丽说：“你不要太高兴，我们都过的是抗战生活，认识的都是发国难财的人。……四奶奶之有今日，是重庆的环境造成的。没有这环境，就没有朱四奶奶，就是徐经理贾经理这一类人，也不会存在。”（20）四奶奶在抗战胜利之夜自杀了。重庆的下江人的归返故园心理并不轻松，他们已被战时重庆所改造、所异化。贫穷者归家的路显得千里迢迢，骄奢淫逸者已离不开陪都的环境，情操高洁的知识分子已找不到记忆中的精神家园。下江人，充满归去的惆怅。

三、战时语境下重庆公教人员的生活故事

张恨水的小说在陪都重庆很受读者的欢迎，讲述重庆故事的小说尤其如此。抗战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张恨水除了讲述重庆故事，也讲述外省的抗战故事、歌女故事和历史故事。但好几部小说都中途夭折，未能写完。如写游击队抗战故事的《潜山血》（发表于香港《立报》）《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发表于安徽《立煌皖报》）《游击队》（发表于汉口《申报》），因政治原因或作者自身原因，未能写完。发表于重庆《新民报》的《冲锋》，出单行本时题目改为《巷战之夜》，是张恨水小说单行本中字数最少的。同样刊登在《新民报》上的《疯狂》，则“越写越胆小，到写完的时候，几乎变了质。书写完，发现完全违背了我的原意，连报上的陈稿，我也不愿剪集，更不用说是出版了。”（21）发表于《昆明晚报》的《雁来红》也未登完。战后几年在北平写的长篇《一路福星》《马后桃花》《岁寒三友》《雨淋铃》《玉交枝》因稿费或交通问题，都没有写完。（22）四十年代张恨水属于重庆故事之外的长篇小说，半数属于未竟之作。与此形成对照，张恨水战时发表于重庆的写重庆故事的《八十一梦》《牛马走》《偶像》《第二条路》（即《傲霜花》），和战后在北平创作的重庆故事《巴山夜雨》《纸醉金迷》，都连载完毕，并无一部出现半拉子的结局（《八十一梦》属于可以随时打住的小说，它的被迫腰斩并不影响其完整性）。而且，张恨水对战时重庆题材的长篇小说和散文集《上下古今谈》《山窗小品》等，自视亦不贱，甚至流露出自我珍惜之意。

我们耗费篇幅介绍以上情况，指出张恨水的重庆故事的完整性，是为了说明：与其他题材故事相比，重庆故事对张恨水来说，是“不得不说”的故事，情感体验深厚，素材储备丰富，创作起来得心应手；重庆亦纵容张恨水对这个城市说三道四，描画市民众生相（只要对当局的批判不过于激烈直露），慨允他的重庆故事行云流水般地在《新民报》连载，定期与读者见面。进而引发我们思考：张恨水重庆故事的讲述，与张恨水的重庆体验、陪都的生态图景、读者的阅读心理之间，是否存在密切的关联？

学界对张恨水四十年代小说的研究，非常在意阐明张恨水小说所记录的“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23）而张恨水的重庆生活体验、陪都的城市语境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则没有得到更多的阐释。张恨水的长子张晓水认为，文艺家对张恨水著作的研究和评价，应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及其背景、作用区别开来”。（24）张晓水在这里所指的“背景”，对于张恨水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而言，除了抗战的大背景，还有重庆的陪都背景，张恨水的抗战生活背景。对张恨水四十年代的小说“作用”的解读，本文注重的不是其消闲娱乐功能、政治批判功能、民族意识的表述功能和社会众生相的摄取功能，而是其心理疏导功能。

张恨水讲述重庆故事的小说，属于“社会小说”，与他二、三十年代言情为主的路子有别。“社会”是个大概念，更具体来说，重庆故事“趋重于生活问题”。（25）促成张恨水写作路向改变的因素很多，本文关注这几个因素：一、张恨水小说和重庆《新民报》的读者定位；二、张恨水的重庆生活体验；三、对重庆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公教人员的生存境况忧心忡忡；四、对身份易位和斯文扫地的难以释怀。

陪都重庆的公教人员众多。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北平、上海、南京等地迁入重庆的高校达39所，（26）重庆市的郊区和疏建区容纳了大量的教员。同样，国民政府庞大机构的迁入，使得重庆的公务人员猛增，“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7.68﹪”。（27）因此，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报》在读者定位上，偏向中下层公教人员。“《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后，……根据抗战而迁渝的读者的广泛性，他们以城市市民——偏重中下层公教人员为主要对象。”（28）“那时，《新民报》是由一张对开报，改为小型四开的。倒有两个副刊。”（29）张恨水主编其中的一个副刊，他的《八十一梦》《牛马走》《第二条路》（即《傲霜花》）《偶像》四个长篇都发表于重庆《新民报》的副刊上。张恨水作为通俗小说大家，作为老报人，在创作中，读者意识自然非常敏锐，《新民报》的读者定位可以说也就是张恨水小说的读者定位。《新民报》的读者定位和张恨水的重庆生活体验以及重庆公教人员的生活状况、社会心理，使得张恨水的重庆故事“趋重于生活问题”。

战时重庆，由于是大后方、陪都，由于崇山峻岭构设了天然的屏障，因此，战争前方和沦陷区人们直面的生死攸关、民族存亡问题，对于庇护于“抗战司令台”的市民来说，在体验的切身感和深刻感上是打了折扣的。当生死存亡问题不用过分担忧，日常生活的要义便凸显了出来。战争使陪都普通市民最感闹心的问题，是生活的问题，这一点，张恨水是深有体会的。张恨水来重庆一段时间后，搬往远离市区的南温泉桃子沟，住的“国难房”是竹片夹泥的墙，屋顶盖茅草，每到大雨来临，屋内雨流如注，张恨水戏称为“待漏斋”。住的如此，吃饭穿衣亦感愁苦。张恨水“由入川起，三个年头没缝一件小褂子。”（30）为了一家人的吃饭大事，张恨水往往“要从市里背着几十斤重的‘平价米’，撩起长衫，过山涉水，行于险峻仄窄的山间小道上。”（31）对于张恨水这样的知识阶层来说，这种生活境遇在战前是难以想象的。房子紧张，物资紧缺，物价飚升，使得生活问题成了陪都普通市民，尤其是公教人员的头痛问题。与张恨水同住桃子沟的，“全是受难的公教人员，穷的教员，穷到自己浇粪种菜。大家见面，成日的谈着活不下去”。（32）与中下层公教人员挣扎在饥饿贫困线上相对照，陪都的许多官僚和商人，或利用职权，或囤积居奇倒买倒卖，且二者相互勾结，大发国难财，纸醉金迷，腐化堕落。张恨水所住的“村子里也有极少数的投机商人”，对村里的公教人员“很是一种刺激”（33）。“待漏斋”对面不远的山上，建有一座豪华无比的孔（祥熙）公馆，引起张恨水的“愤概情绪”。在疏建区“看到阔人新盖的洋房，在马路上看到风驰电掣的阔人汽车，看到酒食馆子里，座上客常满，就会让人发生疑问：一样在‘抗战司令台’畔，为什么这些人就不应该苦？”（34）在张恨水的重庆故事中，生活问题是中下层公教人员最头痛的问题，生活境遇的强烈反差又是知识分子最愤愤不平的问题。正是这样的环境、生活和情绪，形成了《牛马走》《纸醉金迷》《傲霜花》《八十一梦》等小说讲述的重庆故事的题材、人物、情节和观念。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商人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公教人员仰人鼻息生活困窘，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为物所役，权势阶层和有钱商人奢靡享乐道德堕落，这些内容成了张恨水重庆故事的重心。

四、重庆市民身份地位的重组与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胜

读张恨水的重庆故事，我们自始至终可以感受到知识分子的愤懑情绪，这种情绪源自对陪都种种混乱腐败现象的愤愤不平，也源自知识分子对自我遭遇的耿耿于怀。因愤愤不平、耿耿于怀，便谴责堕落、暴露邪僻。所以，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称他在重庆创作的小说为“批判谴责小说”（35），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则称《牛马走》等小说为“暴露小说”（36）。《八十一梦》就是“借着记述梦里的事情”，来发泄了“飘零做客”的“许多不能自已的悲鸣”（37）。张恨水对陪都乌烟瘴气现实的揭示，与茅盾等作家从阶级、政党所做出的意识形态批判有别，他头脑中还“承认国民党反动派是‘正统’”（38）。其供职的《新民报》采取的亦是“居中偏左，遇礁即避”的编辑方针。张恨水对重庆腐败堕落社会现实的针砭，更多是出于传统文人的“正义感”，对荣辱易位、价值观念颠倒的状况强烈不满。

战时重庆是流亡者聚集的城市，但与上海那样的移民城市又有所不同。重庆的移民不仅经历了地域空间的漂移，而且大多经历了身份地位的起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的流动分为两种：一种是水平的社会流动，一般是指居住地的改变,即人口迁移；另一种是垂直的社会流动，是指社会地位的变化。”（39）战前的公务员和大学教师，毫无疑问是社会的精英和中坚分子，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能获得满足感，令普通市民艳羡或敬慕。战争爆发后，教育、文化、艺术便变得不大紧要，“抗战军兴，文人曾一度等诸废物”（40）。在物资紧缺、物价飞涨的重庆，政府提供给普通公教人员的津贴，少得可怜，维持生存都有困难。战争的语境本已使得大后方公教人员变得无足轻重，经济状况进一步把他们推向了社会的底层。《傲霜花》里面的曹晦厂、谈伯平教授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洪安东教授竟然穷到卖书的地步，甚至连颇有声望的唐子安教授，也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为参加同事的婚礼，还得向总务主任和小职员商借衣服鞋子。中下层公务员的处境同样艰难，沦落到与工厂小工同等的境地。（41）区亚雄（《牛马走》）、魏端本（《纸醉金迷》）都受过高等教育，在机关任科员，但工资低微，难以养家糊口。区亚雄一年的薪水还不如转行当汽车司机的弟弟跑一趟境外的收入多，魏端本一月的工资不够老婆在牌桌上赌一次。在张恨水的重庆故事中，贤者、仁者，在重庆窘困落魄；品德恶劣者和战前低微粗俗的下层市民，却大发国难财，在普通公教人员面前一幅神气活现的模样。《牛马走》中的区庄正老先生，出生高贵，其父是清代翰林，他自己也是有名的教育家。由南京流亡重庆后，全家生活维艰，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子，不得不放弃助理医生和中学教员的“高尚职业”，一个改行贩卖蔬菜，一个当汽车司机。而以前在南京当包车夫的李狗子、开老虎灶的褚子升，却在重庆混得人模人样，派头气焰很高。这些人都经历了地域和身份的两次位移，只是原本高贵的知识分子，到重庆后沦落底层，由中心而边缘；原本粗俗低微的下层人，到重庆后成了腰缠万贯的成功者，由边缘而中心。边缘中心的变异和对照，也体现在小说叙事空间的设置上。张恨水的重庆故事在叙事空间的设置上，基本上是在重庆的繁华市区和僻陋的乡村疏建区之间往返穿梭。在人物往返穿梭于城乡的过程中，贫富的悬殊、地位的落差以及灵魂的变迁，得到了诠释。《傲霜花》开头两章就构成了生活空间的鲜明对照。戏子王玉莲在市区拥有一所西式楼房的半个楼面，她梳妆台上陈列的化妆品之多，简直像开了一个化妆品展览会，招待客人的菜肴有重庆市面上不易买到的虾、蟹、鱼，连女佣人的衣服首饰，都比小学女教员讲究。而王玉莲的老师，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的唐子安教授，却住在郊区逼窄的草屋里，一家人就着萝卜干喝红薯糙米粥，只有白开水招待客人。小说还通过华傲霜、施伴云的行踪，进一步把市区权势人士、发迹商人的豪华公馆与大学教师的贫民窟生活进行了对照。在结尾还不忘来一番悲喜参照：一边是卧病山村的谈伯平教授逝世，无钱料理后事；一边是市区皇后大厦正举行一场豪华婚礼。重庆故事的对照性书写，揭示了战时重庆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把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愤愤不平情绪表露无遗，迎合了《新民报》预设读者的心理需要。

张恨水的重庆叙事对读者心理的迎合，除了暴露腐败官僚、投机商人的丑恶品性，为公教人员的愤愤不平情绪提供发泄的渠道，如：《八十一梦》“在痛快两字上，当时是大家承认的”，“引起读者的共鸣”。（42）还有意渲染有节气的、落魄的公教人员的“精神优胜”，解剖被金钱女色异化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痛苦，达到对中正善良的知识分子进行心理治疗和精神抚慰的目的。重庆故事的正面知识分子形象，无论如何穷困、失意，都凭借其脱俗的情操、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学养，在精神上获得了优胜。《巴山夜雨》中的李南泉，住茅房，吃“平价米”，抽“狗屁牌”香烟，但投机商人、保长夫人、公馆副官同样得屈就他，他以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智慧，淡然自若应对金钱和权势的威压，保持着心灵的怡然自乐。《牛马走》中的区庄正在战时重庆属于无钱、无权、无职的“闲人”，就因为他刚正不阿、安贫乐道、饱读诗书，叙事者便让他在与各类人物的交往中处于精神优胜的地位，让善良的杨老幺对他感恩戴德，让出身低微经商发迹的李狗子急于借他的荣光，让气焰嚣张的蔺二爷、慕容仁在他面前显得虚伪浅薄、丑态百出，让掮客西门博士在他的面前露出“小人”嘴脸……在《傲霜花》中，穷困潦倒的洪安东教授迫不得已拿校工借给他的钱给女儿治病。这件事让堂堂大学教授颇觉颜面扫地。为了维持一个值得尊敬的教授的精神优胜，小说一方面把借款处理为校工主动提出，另一方面不忘渲染校工态度的恳切、言辞的卑微。在阅读这些人物的故事时，以中下层公教人员为主的重庆知识分子，从中能够寻觅到价值的认同感和身份的尊严感。对被金钱女色异化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痛苦的解剖，则从反面为中下层公教人员甘守清苦生活提供了情感援助。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流亡到战时重庆的外省人，在物价飞涨的经济状况下，大部分都谈不上有“恒产”。既然无恒产，普通市民便难以坚守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原则，部分知识分子也在生存的压力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人生理念，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加入生存竞争的行列。《傲霜花》中的大学教师梁又栋，在文坛小有名气的苏伴云，名字“取意于菊残犹有傲霜枝，透着有几分孤芳自赏”（43）的华傲霜，都为生活所迫，选择“第二条路”，或经商，或做官，或嫁有钱老头，从而摆脱困窘的生活状态。这些尚属正派的改行者，为身陷困厄而不愿入俗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清高的理由——不是不能混得更好，而是不愿走“第二条路”。那些违背了知识分子基本道德准则的人物，则难以逃脱心魔的折磨和命运的捉弄。《偶像》中的著名雕塑家、青年人心中的精神偶像丁古云，为女色所诱惑，上了一回大当，自我的偶像轰然坍塌，痛心疾首，无脸见人，过着隐名埋姓的生活。《牛马走》中留过洋的西门德，一方面在演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知识分子坚守抗战岗位的伟论，一方面打着博士的招牌，借筹办“工读学校”的幌子，干着掮客的营生，勾结官商，投机钻营，大发国难财。虽然过着酒肉生活，灵魂却被异化，在金钱的刺激下，西门太太中了“钱魔”，精神都出现异常。黄万华先生认为，在战争的特殊年代，“战争不仅仅意味着死亡、苦难，它以‘生存’这一巨大的诱因引发着人性的种种弱点、劣根，构成着对人类文明习俗，包括知识分子的操守的严峻挑战。”（44）张恨水的重庆故事把人性弱点劣根的大爆炸与知识分子操守的艰难呵护交织在一起，贬褒之间，体现出作者对古典人文情怀的守望，和对坚守岗位的重庆中下层公教人员的精神声援。

余论：张恨水的重庆书写飘浮着北京、上海、南京的城市光影

本文对张恨水重庆题材小说的解读，是把“战时重庆语境”作为逻辑思维的起点，来生发相关判断。尽管我们在整合六部长篇小说的审美文化共性时，力图避免以偏概全的弊端，然而，我们得承认，以“重庆语境”来笼罩对张恨水重庆题材小说的论述，难以完全避免把“战时重庆书写”与“战后重庆书写”等量齐观的偏颇。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有着非常敏锐和清醒的读者意识，本文也主要着眼于从读者心理层面来探讨重庆语境下张恨水的重庆书写。张恨水在在战时重庆创作的《八十一梦》《牛马走》《傲霜花》《偶像》，与在战后北京创作的《巴山夜雨》《纸醉金迷》，基本文化审美特性方面，固然趋同（都是“以重庆为背景”，故事来源于重庆生活体验，且张恨水在北京创作重庆题材小说，是为自己的那段重庆生活作“一个深刻的纪念”），但是由于所面对的城市和读者群体有差异，因此，它们在文化品格、人物塑造和题材选择等方面的路数，就不可能毫无二致。给北京《新民报》写的《巴山夜雨》带有“京派”的作风，主人公李南泉的闲情雅致中透露出浓厚的文人气息和书斋风味，随着他的故事的展开，重庆乡村的田园风光被频繁呈现。小说并不追求故事的紧张曲折，更多聚焦于战时文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夫妻、邻居间的琐碎交流，叙事节奏舒缓，与其他几篇小说在风格上有所区别，切合了老皇城子民的精神气度。给上海《新闻报》写的《纸醉金迷》，则迎合了上海的城市季风。小说以黄金投机风潮作为主要情节线索，讲述了商业投机者、交际花、银行家的故事，描绘了摩登人士颓废享乐的生活和疯狂乖戾的性格，展现了金钱和欲望对人际关系的掌控。如果把小说的故事、人物、性格的基本元素抽离重庆的背景，置入上海的时空，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海的故事。由此可见，张恨水战后创作的两部重庆题材小说，不仅与重庆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混合了张恨水对北京和上海城市季风的理解。什么样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这是为张恨水的重庆题材小说创作所表明的。

研究张恨水在重庆创作的重庆题材小说，同样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除了重庆语境，文本中是否还飘忽着北京、上海的身影？张恨水曾在北京长期生活过，也有过不算浅的上海、南京城市生活体验。这几个城市带给他的文化记忆和对他的创作品格的塑造，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重庆时期的创作。况且，自京、沪迁移到战时重庆的市民群体和随之带来的文化风尚，同样会参与到张恨水重庆书写的文本内外。虽然一时难以把这些因素从张恨水创作的重庆语境中剥离出来，加以系统化，但是我们或深或浅可以感受到一些。我们不妨提供点不成系统的看法和例子。张恨水在小说中多处把上海、南京与重庆进行类比叙述。《牛马走》中的魏太太认为“重庆一切内在的情形像上海”，（45）《八十一梦》“第八十梦回到了南京”把光复后的南京当作重庆的一个翻版，在战后发表于上海的《纸醉金迷》讲述的重庆故事，似乎有上海的影子漂浮其上。这些，让我们感觉到张恨水小说的重庆语境投射着北京、上海、南京的斑驳光影。张恨水自己说《八十一梦》“将神仙鬼物，一齐写在书里”，讽喻的是“重庆的现实。”（46）值得注意的是，《八十一梦》的“第十五梦　退回去了廿年”和“第七十七梦　北平之冬”，给出的显然是二十年代的北平故事，如果把这两个“梦”退回二十年披露发表，也可算是洞悉时代暗流的讽刺小说。当然，文本的实际意义指向是借“第十五梦”讥讽陪都政界的裙带风气，“第七十七梦”则通过揭批“五四”时期所谓的“新青年”不学无术、浅薄无聊、自私虚伪的品性，通过暴露他们打着“新文化运动”旗帜钻营官场的卑污心机，来诠释、影射“民国三十年”重庆的政治现实。在这两“梦”中，张恨水利用了北京的生活阅历和文化记忆，把北京与重庆的怪现状通过“梦”的形式进行置换，借“北京”说“重庆”。在张恨水的重庆书写中，才子佳人模式并未彻底放弃，只是佳人为戏子，才子却为落魄的知识分子，如《傲霜花》中的苏伴云和王玉莲，《牛马走》中的李大成与黄青萍，《偶像》中的丁古云和蓝田玉。在这几部小说中，戏子与才子为师生或同学关系，如：苏伴云曾是王玉莲的家庭教师，黄亚萍和李大成是同学，蓝田玉冒充为丁古云的学生。张恨水三十年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受戏剧电影手法的影响较大。他说：“我喜欢研究戏剧，并且爱看电影，在这上面，描写人物个性的发展，以及全部文字章法的剪裁，我得到了莫大的帮助。关于许多暗和的办法，我简直是取法一班名导演。”（47）在重庆创作的重庆题材小说，同样如此。“本书开场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的重庆一个集会散场的时候”（《牛马走》），这样的开场白有点像剧本舞台场景说明。还有人物性格的参差配合，情节的张驰处理，悲喜剧场景的对照和转换，以及人物神情动作的描写等等，都带有戏剧和电影的技巧风格。戏子与知识分子的人物关系模式，和对戏剧电影手法的借鉴，我们可以从重庆语境做出解说。战时重庆文人很多，但重庆的娱乐生活非常单调，对于文人来说，也就只有看戏看电影，自然文人与戏子发生故事的可能性较大。这样的城市文化语境能够解释张恨水小说的人物关系和影视技法。不过，理由并不是很充分。张恨水在重庆较少有机会有余钱看戏看电影，尤其是住到南温泉后。因此，对张恨水重庆题材小说的这种特性的解说，只能悬置在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的城市语境和张恨水的多个城市体验之间。

注 释：

（1）、笔者查阅的研究述评和会议综述为：《张恨水研究七十年述评》，载《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90年代张恨水研究述评》，载《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张恨水抗战作品研究述评》，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在辨诬的基础上向纵深领域迈进——国内首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概述》，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斯人虽已没 千载有余情——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张恨水抗战作品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2）、小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时的题目为《牛马走》，后来出单行本时改名为《魍魉世界》，有所删节，本文采用的是团结出版社根据小说连载整理出版的足本《牛马走》。

（3）、小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时的题目为《第二条路》，出单行本时改名为《傲霜花》。

（4）、张恨水：《八十一梦·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35。

（3）、张恨水：《纸醉金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79页。

（7）、张恨水：《晚香玉花下》，《张恨水散文》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8）、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

（9）、张恨水：《傲霜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0）、陈兰荪、孔祥云编著：《回眸下江人》，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1）、陈兰荪、孔祥云编著：《回眸下江人》，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2）、张恨水：《偶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3）、张恨水：《牛马走》，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4）、张恨水：《纸醉金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15）、张恨水：《八十一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16）、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17）、张恨水：《晚香玉花下》，《张恨水散文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235页。

（18）、张恨水：《八十一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9）、张恨水：《八十一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0）、张恨水：《纸醉金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79页。

（21）、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73页。

（2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93页。

（23）、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77页。

（24）、江流：《潜山怀人》，《张恨水研究资料》，张占国、魏守忠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25）、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77页。

（26）、李怡、肖伟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45页。

（27）、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

（28）、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29）、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73。

（30）、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84。

（31）、张晓水、张二水、张伍：《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张恨水研究资料》，第168页。

（3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80。

（33）、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80。

（34）、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84。

（35）、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张恨水研究资料》，第127页。

（36）、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37）、张恨水：《八十一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38）、张恨水：《<八十一梦>前记》，《张恨水研究资料》，第256页。

（39）、朱丹彤:《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动及影响》，《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

（40）、张恨水：《八十一梦·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41）、“在战前,公务员的待遇与社会地位都较高,以简任官与工厂里的小工相比,简任官月薪五百,小工工资仅一二十元,相差天壤；而战后情形发生剧变,公务员的薪金基本保持原状,小工收入则已由每月一二十元增至五六百元”。见朱丹彤：《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动及影响》,《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76页。

（43）、张恨水：《傲霜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44）、黄万华：《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45）、张恨水：《牛马走》，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46）、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写作生涯回忆》，第134页。

（47）、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张恨水研究资料》，第275页。

**作者简介：李永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